



经济全球化的困境与前景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dux

刘遵义

研究专论第六十号

二零一七年九月

香港中文大学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
香港新界沙田泽祥街十二号郑裕彤楼十三楼

鸣谢

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衷心感谢以下捐助人及机构的慷慨捐赠
及对我们的支持 (以英文字母顺序):

捐助人及机构

查懋德	雅居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郑海泉	亚洲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蔡冠深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胡祖六	银联金融有限公司
刘佐德及刘陈素霞	中国概念(咨询顾问)有限公司
刘遵义	第一东方投资集团
利乾	四洲集团有限公司
梁锦松	恒隆地产有限公司
李伟波	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吕耀东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黄志祥	弘毅投资
孙少文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王庭聪	丽新发展有限公司
荣智权	刘佐德基金有限公司
盛智文	敏华控股有限公司
	星岛新闻集团有限公司
	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大生银行有限公司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The Lanson Foundation
	永隆银行有限公司

活动赞助人及机构

周松岗	盘谷银行
蔡清福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方方	中国银行金边分行
方正	北山堂基金
冯国经	国家开发银行
李伟波	金陵华软
黄桂林	厚朴投资管理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金边分行
	金陵控股有限公司
	新华集团
	The Santander-K Foundation
	银联国际

经济全球化的困境与前景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dux[§]

刘遵义¹

2017年9月

摘要：经济全球化包括跨国、跨境的商品与服务贸易和跨国、跨境的直接投资、证券与各种金融投资、跨国、跨境资本的流动、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流动、人员与游客的往来以及信息的流通。每一个参与全球化的经济体，无论大小，都会获益。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在每一个经济体的内部，也会创造赢家和输家。但在很多经济体之中，这些输家并没有被照顾到，所以他们就会对全球化质疑，认为全球化对自己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所以支持非全球化。因此假如全球化要持续运行，就需要考虑如何补偿这些输家。问题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调整分配，不会补偿输家，所以政府必须主导与采取积极的政策。

让所有人民都能从全球化中得益，是每一个政府的责任。对于如何降低一个经济体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成本，有几个建议：一，课征进出口税；二，课征托宾税；三，强化社会安全网；与四，投资无形资产。

[§] © 2017 香港中文大学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

¹ 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李国鼎经济发展讲座荣休教授。此文为作者于2017年5月9日台湾中央大学余纪忠讲座之修订演讲稿。作者感谢邱正雄博士，许家栋博士与余范英女士之宝贵意见与建议。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并不必然反映与作者相关各机构的观点。

邱院长、范英、各位校长、各位教授及各位同学，今天非常荣幸能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余纪忠老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一位长者，我们两家有几代的交情，所以我今天能够到中央大学担任余纪忠讲座的讲者，觉得非常荣幸与高兴。

今天的讲题是「经济全球化的困境与前景」，先谈困境再讲前景。对于全球化，我基本上是乐观的，我认为困境是可以面对、可以脱离、可以克服的，前景也是光明的。

经济全球化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全球跨国、跨境的商品与服务贸易和跨国、跨境的直接投资、证券与各种金融投资 (portfolio investment)、跨国、跨境的资本移动、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流动、人员与游客的往来以及信息的流通，都可算是经济全球化的一部份。经济全球化其实不是一个新现象，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汉朝时就有张骞远通西域，开拓了丝绸之路。欧美各国的全球化活动，开始得比较晚。西班牙人自十五世纪后陆续征服了拉丁美洲和菲律宾；葡萄牙人于十六世纪抵达印度、中国、台湾与日本等地；十七世纪，荷兰和英国则分别有东印度公司作为他们全球化（及殖民）的工具；十九世纪，美国军舰进入日本长崎港，强逼日本开放；二十世纪初，也有美国的「中国飞剪号」(China Clippers) 从事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所以全球化并不是新现象，只是最近几十年全球化的速度大幅提升，这其中的许多因素等一会会陆续说明。

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汤玛士·佛里曼 (Thomas Friedman) 写过一本书，叫《地球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书中阐明全球化已经可以达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现在很多人开始质疑全球化，这就是全球化面临的困境。

这里让我先谈一下，全球化可以给全球经济带来很大利益，总体来说，每个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经济体，无论大小，都会得到好处，只是有些经济体受益比较多，而有些经济体受益比较少。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所有参与全球化的经济体，它们所能选择的商品与服务，都会比参与全球化之前大大增加，所以它们一定都会比以前好。

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在每一个经济体内部，也会造成赢家和输家。赢家就是出口商、进口商和进口商品与服务的消费者，输家就是被进口商品或服务替代的产业和雇员。但由于各个经济体一直都没有太照顾到这些输家，所以引发他们对全球化的质疑，认为全

球化对自己不但没有甚么好处，反而有坏处，英国脱欧就是在这种思维之下的反应，又如川普选上美国总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化之下输家的反弹。而本次法国大选落选的玛琳·勒庞 (Marine Le Pen) 女士，也有很多反全球化的支持者，基本上可以说是由一群全球化之下输家所拥戴的。

因此全球化如要持续下去，我们就必须考虑如何补偿这些输家。原则上，全球化之下每一个参与的经济体都会得益，所以应当是可以没有输家的；这是因为全球化的利益应当是可以足够让大家分享，让每个人都可以有进步，每个人都会比以前更好。问题在于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调整分配，不会自动补偿输家，所以要达成这样的结果，就必须由政府主导与采取积极的政策。

我的演讲的英文题目叫做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dux**。「**Redux**」一词根源自于拉丁文，其意为再次回来或是浮升的意思。目前经济全球化已走到一个转折点，但在适当的条件与适当的政策之下，是可以继续下去，再一次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

首先，让我们回顾过去，这几十年来，全球的实质 GDP 与全球贸易总量皆增长快速（见图 1）。红色线显示全球的实质 GDP，蓝色线显示全球贸易总量，红色纵行显示全球实质 GDP 的年增长率，蓝色纵行显示全球贸易总量的年增长率，可见在 2012 年之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全球贸易的增长率显著地高于全球实质 GDP 的增长率。贸易总量比 GDP 增长得快，所以这段期间的全球 GDP 增长，可以说是由贸易增长带动的。也因为如此，也促使全球的实质商品与服务贸易与全球 GDP 的比例，从 1993 年至 2008 年期间，持续大幅度上升，一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止（见图 2）。

图 1：全球实质 GDP 与全球实质商品与服务贸易总量及它们的增长率
(2015 年美元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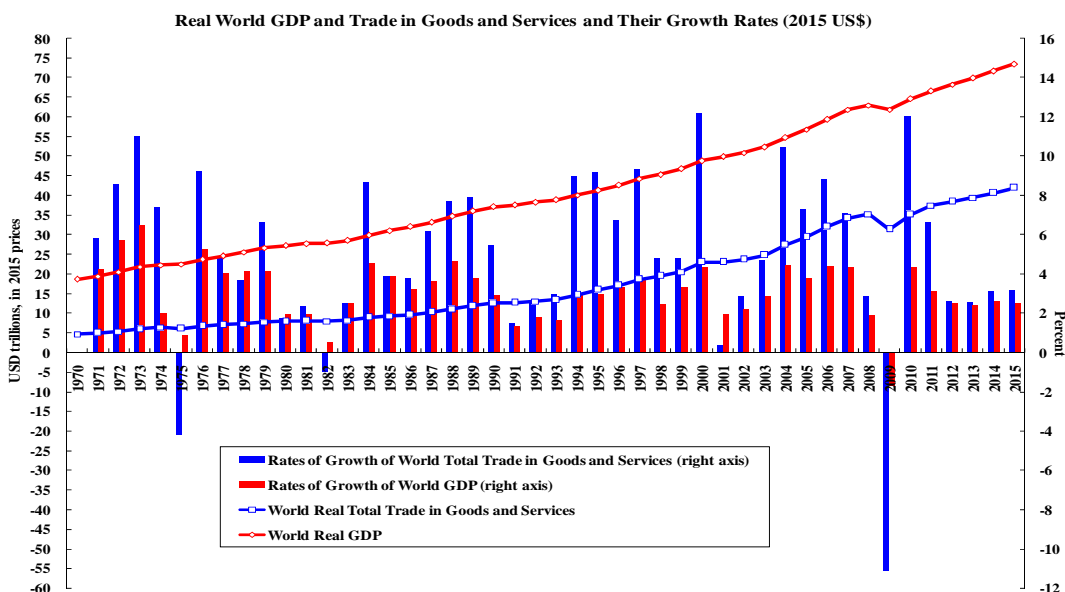


图 2：自 1960 年起全球商品与服务贸易总量与全球 GDP 的比例



其实回想一下，在东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经济首先崛起，然后香港、台湾、新加坡与南韩亚洲四小龙的跟进，与后来的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增长，其实主要都是由出口带动工业化，由国际贸易增长所带动的。所以，东亚经济体得以从低收入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其实都是拜经济全球化之赐。

但自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和全球 GDP 的增长速度呈现停滞现象。2008 年至 2015 年，全球 GDP 和全球贸易的平均年增长率已分别跌到 2.2% 和 2.5%，贸易不再是推动经济的原动力。

全球贸易快速增长的原因

为什么当年国际贸易会迅速增长？第一，早期的国际贸易存在许多贸易壁垒，如各种关税和非关税的障碍，世贸组织 (WTO) 成立之后，各会员国彼此对外都抱持比较开放的态度。而贸易障碍，不管是关税的还是非关税的，都逐渐减少。而且世贸组织也不遗余力地推动自由贸易。此外，全世界也有许多自由贸易区，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和经济共同体纷纷成立，这都有助于国际贸易增长。

第二，在过去几十年间，全球经济有很多新的参与者，比如中国大陆在 1978 年改革开放后开始参与，俄罗斯是 1990 年以后正式跨入今天的世界经济，还有包括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国家等加入，从而促进贸易活跃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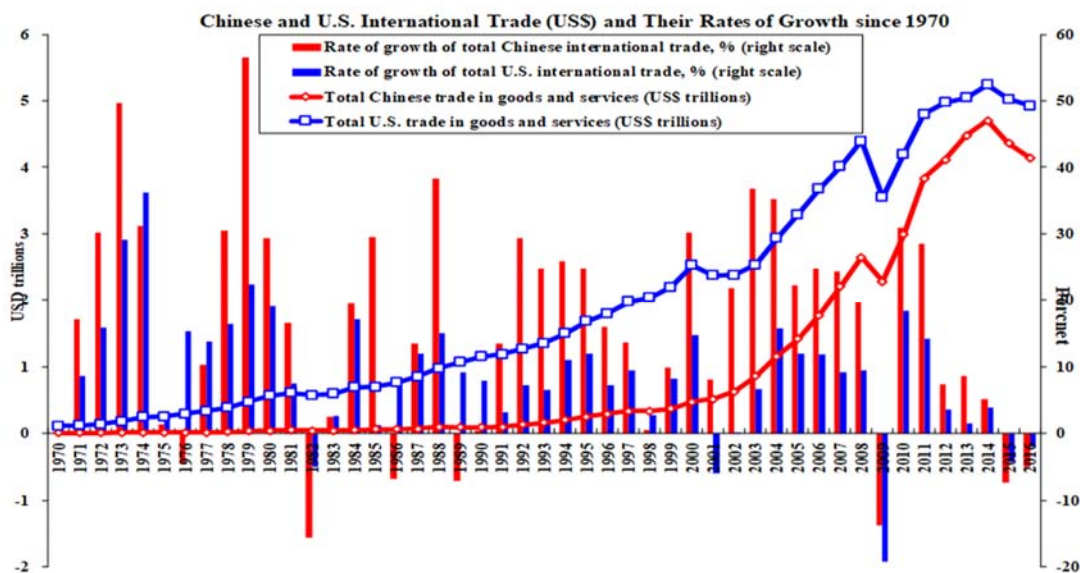
第三，是生产方式的碎片化 (fragmentation)，我也称它为生产方式的非垂直化 (de-verticalization)。一个生产垂直化的企业意味着所有的零配件和所有的工序，都由企业自家生产作业。近几十年来制造业最大的改变就是非垂直化，生产分工越来越细，很多产品采取跨国或跨境分工，部分企业只做供应链的一部份。以苹果手机为例，芯片可能是台湾台积电生产的，但是内存可能是由韩国生产，屏幕可能在日本生产，最后则在中国组装，所以生产供应链非常国际化。在生产非垂直化下，一个产品的各项零组件和半制成品可能来自很多国家，这些跨国分工都需要运输与物流业支撑，而大幅度增加国际贸易的总量。

第四，是采用共同货币。2000 年欧元诞生后，在欧元区里所有国家采用共同货币，只需在一个经济效益最大的地方生产，就可以供应整个欧元区。以前欧洲共同体会员国之间，虽然没有关税，但是关税只是贸易障碍的一部份，另外一部份就是相对汇率的波动性。举例来说，采取共同货币之前，产品应该由德国生产，运到法国，抑或由法国生产，运到德国，就要考虑到德国马克跟法国法郎的相对汇率问题。有了共同单一货币之后，如果在西班牙生产就可供应全欧元区，那就不必再考虑汇率因素。未来如果欧元崩溃，后果对欧元区将难以想象，所以应当不会发生。

第五，是交通、运输与通讯成本的大幅度降低。这促使商品贸易大量增加。而通讯成本的大幅降低，也促使服务贸易大量增加，使服务业也开始全球化。很多后勤、后台办公室就都随着全球化搬迁到更便宜的地方。例如在美国打电话去查号，接听电话的客服中心可能设在印度或菲律宾，因为通讯成本大幅降低，如果后勤办公室设在这些低工资的国家，成本将比在美国低廉很多。因此，在全球化之下，能够迁走的就业机会都会被迁走，但旅游业是迁不走的，观光资产是属于当地的。此外，大学也是迁不走的。你要来台湾旅游就得真的要来台湾，你要就读中央大学也得来台湾。

美国跟中国现时在是两个世界最大的贸易大国。图 3 显示自 1970 年起中国与美国各自的贸易总量与其增长率。蓝色线显示美国的贸易总量，红色线显示中国的贸易总量；蓝色纵行显示美国贸易总量的年增长率，红色纵行显示中国贸易总量的年增长率。从图 3 可以看出，这两个国家的贸易总量过去一直都在上升，其中中国大陆的贸易增长率，除了少数年份外，均远远超过美国，所以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国，仅次于美国。但两年前美中两国的贸易总量双双开始下降，也局部反映全球化面临的困境。

图 3：自 1970 年起中国与美国各自的贸易总额与增长率



值得观察与提醒的是，在全球化的浮沉中，国别贸易与境内生产总值 (GDP) 比例的变化，在大经济体和小经济体是不同的，因为它们对于国际贸易的倚赖性不一样。让

我们就中国跟美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来做比较，中国跟美国都是很大的经济体，经济成长主要还是以内需为主导，出口不是非常重要。但是对于台湾与香港这种小型经济体就不一样了，出口就非常重要，出口占 GDP 的比例有时会大于百分之一百，出口对经济成长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信息通讯革命加速经济全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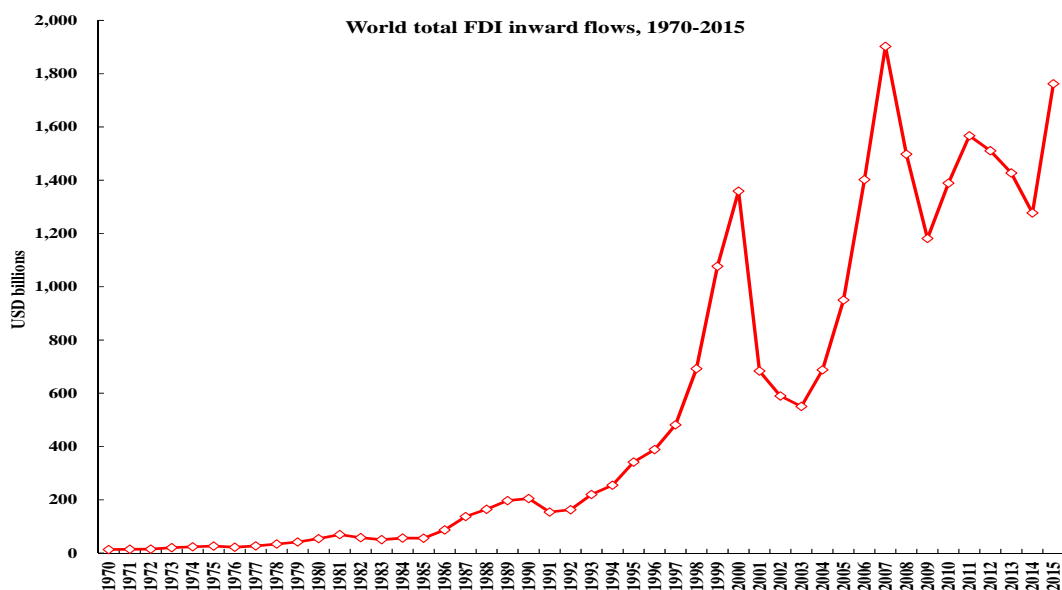
首先，信息跟通讯的技术革命正在演化，全世界讯息传播快速，不论在任何地点发生甚么新闻，马上就可以知道。同样，分公司的营运状况，总公司也可以立即掌握，地理距离已经不是大问题，例如在台北就可以控制高雄甚至上海的工厂，这也是信息跟通讯发达所造成的。

全球使用英语作为共同的商业语言，也加速了全球化的脚步，例如英国脱欧，留在欧盟里面用英语的只剩下爱尔兰跟马耳他两个比较小的国家，有人开玩笑说，欧盟是不是要改用德文或法文。我认为在看得见的未来，英语应该还是世界第一通用的商业语言。

全球化扩大了市场，令资本回报率提高，特别是无形资本的回报率。例如专利权，创造专利权的成本是固定的，所以假如市场能够再扩大，所得的便都是净利。这就可以理解为甚么中国大陆对苹果这样重要，因为苹果 iPhone 只要靠美国市场就够回本，再开发一个中国市场就是净赚的了。

国际贸易增长的同时，跨境的外人直接投资 (FDI) 也在增加。它增加的理由是，因为很多国家开始欢迎外国直接投资，撤除各种投资与贸易障碍，同时祭出种种的优惠措施，例如免税五年的优惠等等，所以，外人直接投资增长得很快。从图 4 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机开始之前的 1970-2007 年这段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率是 14%，非常高，而且 2007 年那一年的金额高达一兆九千亿美元；在金融危机之后，就变成以平均每年百分之一的速度下降，所以全球化的困境包括全球的贸易量在下降，且外人直接跨境投资量也在下降。

图 4: 全球外人直接投资 (FDI) 总额



跨国资本移动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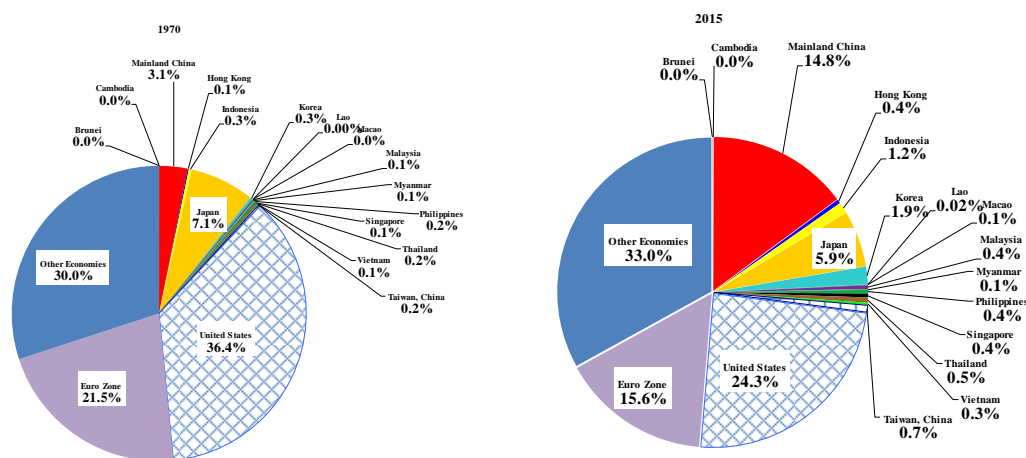
近十年来, 跨境资本的流动大大增加, 尤其是短期资本 (所谓游资) 大量增加。金融危机之后, 美国实行量化宽松, 日本、欧洲中央银行等也跟着实行, 全球货币流动性多得不得了, 但利率非常低, 资本都往回报率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流进流出, 也造成很大的问题。因为这只是短期资本, 流进流出的速度很快, 不像长期资本这么稳定。外国资本流入一般是短期的, 如果当地企业利用这些资本作稍为长期的投资, 就会有下面两个不对称: 第一个是期限不对称 (maturity mismatch), 国内的投资要长期, 但国外资本是短期的, 一旦外国资本要撤资就会有不能偿还欠款的麻烦; 第二个就是货币不对称 (currency mismatch), 本国欠的国外借款是用外币来计算的, 假如汇率变了之后, 尤其是本国货币大幅贬值之后, 恐怕也不一定能偿还得了所有的借款。所以短期资本流入其实是弊大于利的, 但是全球现在还是有很多的短期资本在流动。

全球经济重心转移到东亚

全球化的影响体现在全球 GDP 的地理分布上。第一，全球化造成全球的经济重心的转移，从美国和西欧转移到东亚；在东亚之内，则从日本转移到中国大陆。这些趋势现在还在演化中，因为印度跟中国大陆现在已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两个经济体。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 (Angus Maddison) 教授曾提到，在十八世纪时，中国大陆占全球的 GDP 大概是百分之三十，以后恐怕也会恢复到百分之三十，现在只有约百分之十五，还需要一点时间。而美国和西欧占全球 GDP 的比重会继续下降。

由图 5 可见从 1970 年到 2015 年全球 GDP 比重的变化。左图是 1970 年各国与各区域占全球 GDP 的比例，当时中国大陆的 GDP 只占全球的 3.1%，到了 2015 年（见右图）已达到 14.8%，增加了差不多五倍；美国当年是占 36.4%，现在已经降到 24.3%；日本当年的比例是 7.1%，现在也降至 5.9%，都在下降；欧元区的比例则从当年的 21.5% 降至现在的 15.6%。看得出来美国和欧洲在全球 GDP 的份量已经在持续下降，所以世界经济的重心其实在继续转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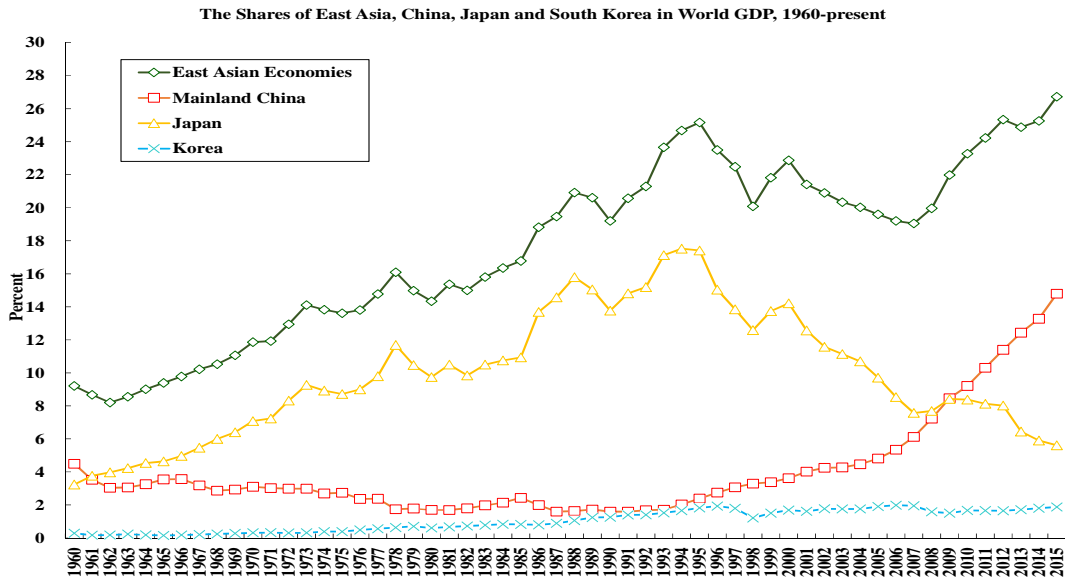
图 5：全球各国与各区域占全球 GDP 的份额：1970 年与 2015 年



在东亚之内，经济重心则从日本转移到中国大陆（参考图 6）。图 6 显示 1960 年迄今，日本、中国大陆和韩国分别占全球 GDP 的比重。绿色线表示东亚，它占全球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 25%；黄色线是日本，最高时一度占全球 GDP 的 18%，现时只占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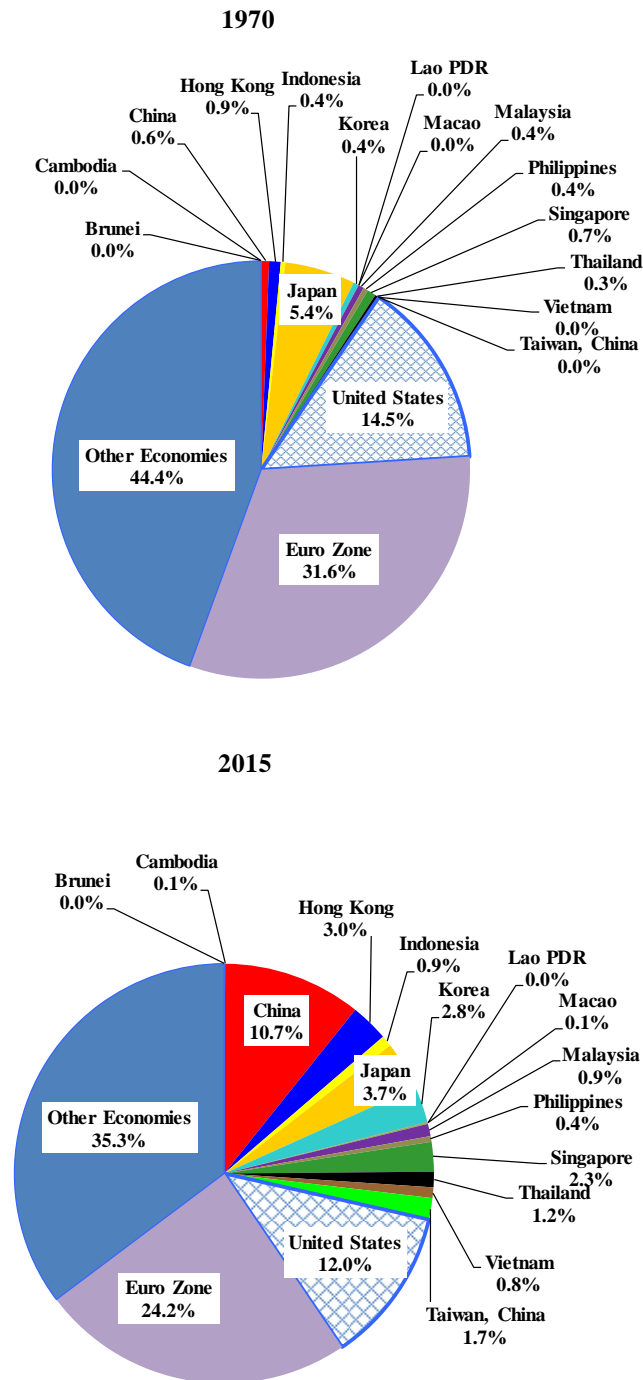
左右；红色线是中国大陆，自 1990 年开始持续上升，于 2010 年超越日本，现时占 14%，还在继续上升之中；浅蓝色线是韩国，约占 2%。

图 6：1960 年至今，东亚、中国大陆、日本与韩国占全球 GDP 的份额



从图 7 也可以看出，全球国际贸易的分布也有同样的趋势。在 1970 年，中国大陆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例仅为 3.1%，至 2015 年则达到 14.8%，美国则从 36.4% 下降到 24.3%。

图 7：全球商品与服务国际贸易的分布, 1970 与 201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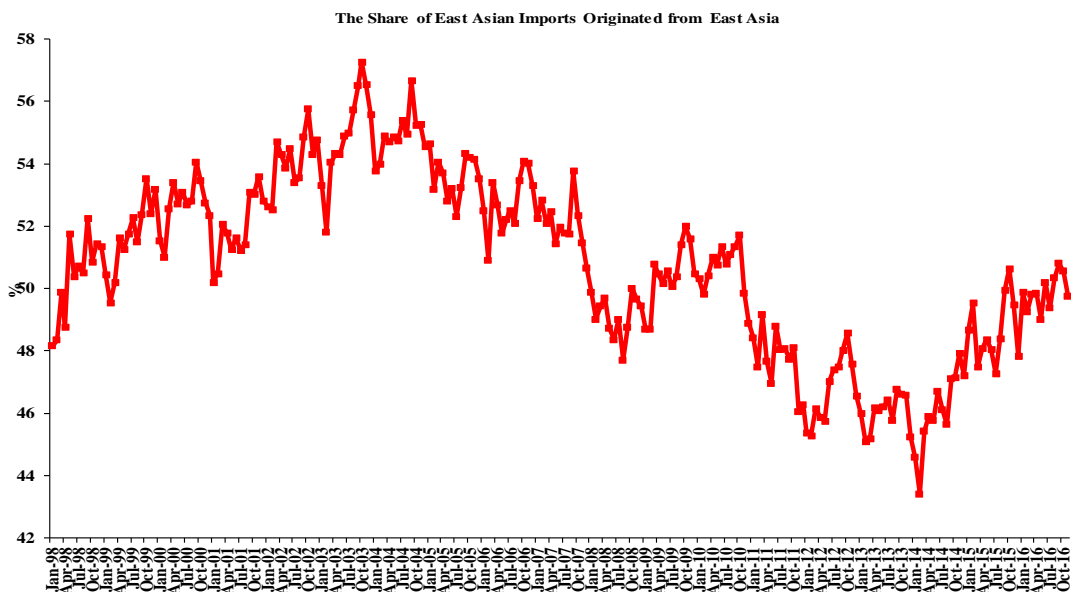
第二：因为世界经济重心从美国、西欧转移到亚洲，就产生了「局部脱钩 (Partial De-Coupling) 假说」。三、四十年前，东亚国家的主要进口伙伴是美国和西欧，东亚经济要仰赖美国和西欧支持，这些地区的经济状况好坏会影响东亚经济，但是最近这二十

年转变了。由图 8 与图 9 可以看出，东亚出口到东亚区域本身的比例，已接近百分之五十，而源自东亚区域内的进口也占百分之五十。在美国经济不景气，西欧经济不振的情况下，东亚经济不会太好，但也不会太坏，因为还可以靠东亚自己的内需，继续运作。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经济体仍有不错的表现，特别是中国大陆，在 2008 年之后，仍能保持平均 6.5% 以上的年增长率。

图 8：东亚出口到东亚自身区域的比重



图 9：东亚进口源自东亚自身区域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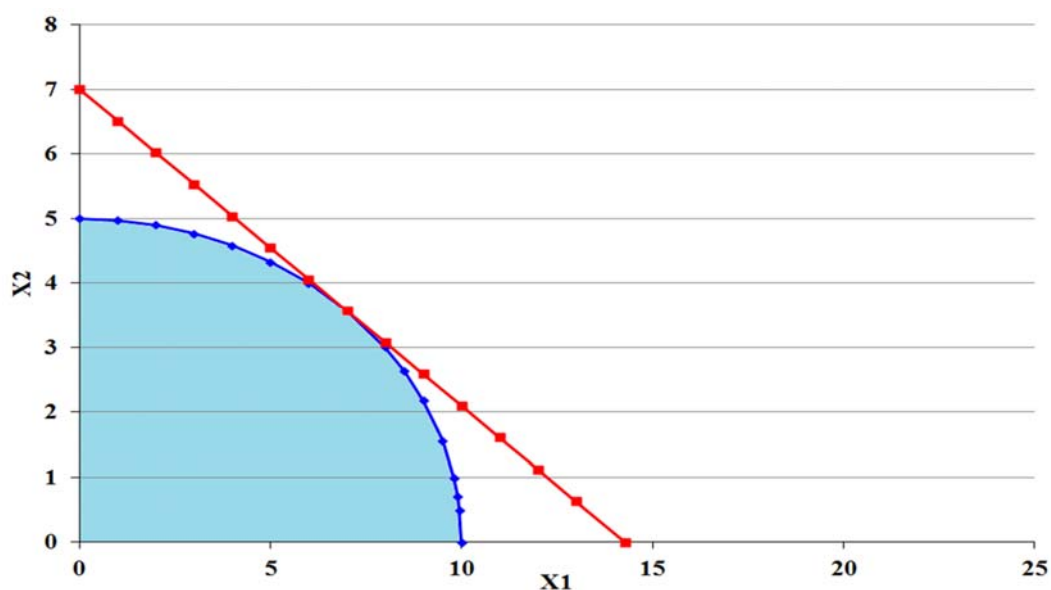


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经济全球化究竟有甚么好处呢?首先, 自愿跨境贸易一定是双赢的。此外, 在全球化之下, 资本的配置会更有效率, 规模报酬更容易达到, 而无形资本的回报率因市场扩大, 也会升高, 主要是因为发明创新的成本是固定的, 市场愈大, 回报率就会愈高。同时, 全球化可促进技术与知识的传播, 并透过旅游或留学, 增进人民跟人民之间的来往交流。有些全球问题也需要各国一起来商议处理, 比如气候变化的问题, 是单一国家无法解决的, 一定要联合起来, 这也是全球化的好处。最后是国际货币铸币权 (seigniorage) 的效益, 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会说明。

两国之间自愿贸易一定是对双方都有利的, 这一点可以用图 10 来说明。图中蓝色部分包括外部的蓝线, 显示在这个经济体里面能够生产出来的两种商品 X1 和 X2 的所有可能搭配, 称为一个经济体的生产可能集合 (set of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同时也等同于在不进行国际贸易之下这个经济体的消费可能集合 (set of consumption possibilities)。图 10 中的红色直线是两种商品 X1 和 X2 的国际相对价格线, 如果一个经济体不从事国际贸易, 则它只能消费它本身所能生产的, 亦即它的消费可能集合就是它的生产可能集合。如果一个经济体从事国际贸易的话, 它可以根据图中红线所代表的国际价格来跟其它经济体进行贸易, 这个经济体便可以用 X2 来交换 X1, 或用 X1 来交换 X2, 所以无论在红色线与两轴之间 (整个三角之内) 任何一点的消费组合都是做得到的, 这表示有很多消费商品搭配的选择, 是不从事贸易之下选择不到的。不从事贸易, 只能选择在蓝色线范围内的商品搭配。可见在从事贸易之下能选择的消费搭配多了很多, 所以一定会更好, 不可能是失利的, 因为最坏的可能就是不贸易, 也不会比以前坏。每一个经济体, 从不参加国际贸易到参加的话, 绝对是会得益的。

图 10: 自给自足与国际贸易下的消费可能集合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讨论。国际贸易一定会让贸易伙伴双方都有好处，但是在两个贸易伙伴之间，究竟谁得的好处比较多？这是很难界定的。所以当川普说美国吃亏了，并不是说美国没有好处，他知道全球化对美国有好处，他的意思是，美国是有好处，可是大量的好处都是让中国大陆、日本跟德国占去了，而美国拿到的好处不够多。

另外一个问题是：虽然全球化对整个经济体来说是好事，但全球化会在每一个经济体的内部，创造赢家和输家，构成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利益重分配问题。谁会成为国际贸易的赢家和输家？参与国际贸易的赢家首先是出口商，因为他们多了国外市场，在出口商品上创造利润和就业机会。其次便是进口商与进口商品的消费者以及使用者（包括使用进口零配件的国内厂商），因为进口商品可能比较便宜，质量比较好，比较多的选择与供应更多元化。可是谁会是输家呢？输家就是跟进口商品竞争的国内产业。由于进口商品能够代替国内所生产的商品，所以会影响这些国内产业与它们的雇员，有些人会失业，而且有些企业甚至会关门。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经济体的内部，都有些人倾向于保护主义或孤立主义，因为政府没有好好地补偿和照顾这些输家，未能让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为全民分享。这个问题，过去各国政府都没有好好地处理。这就是全球化面临的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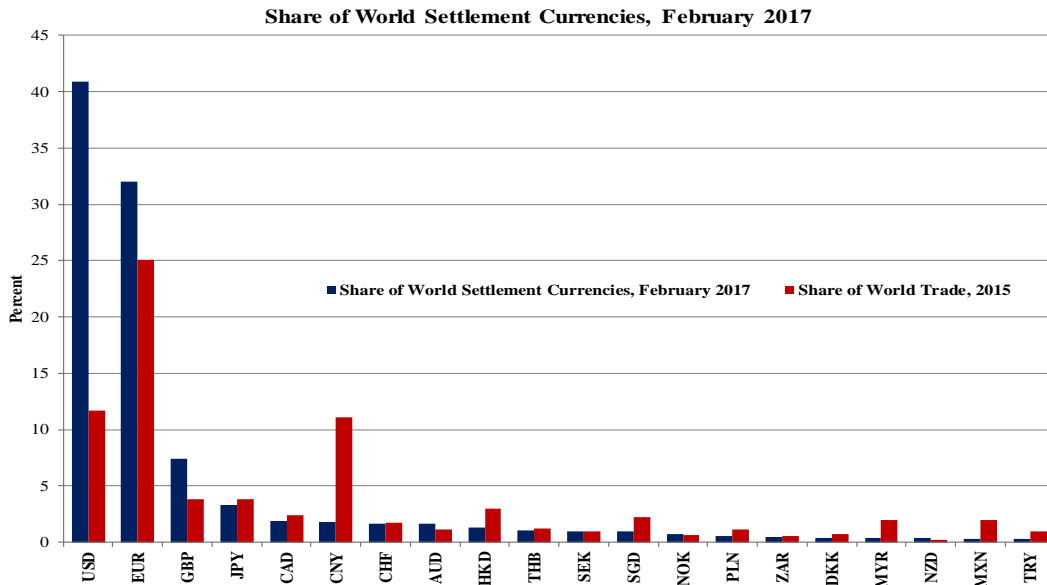
困境。原则上，国际贸易应当产生足够的好处让大家都能分享，但以前差不多没有政府好好地面对这个问题，现在已无法避免，需要严肃处理 and 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独享「铸币权」

接下来我想讲刚才提到的铸币权。两个国家要贸易，如果彼此都不相信对方的货币，就需要使用彼此都能相信的第三方货币作为贸易的媒介，而美元则往往是第三方货币的第一选项，是最常被使用的国际交易货币，因此美国占了很大的便宜，这个我称为铸币权。就是说，美国政府有权印美元，假如一个经济体需要美元，就要卖东西给美国，才能得到美元。美国只需要利用它印刷的钞票，就能换取进口的商品，这就是铸币权。美元其实是一个国际流通的货币，是由美国供应的。原则上，赚到美元的经济体可以利用这些美元向美国进口商品与服务，但它需要储备美元，应付与其它贸易伙伴的交易，所以不会全部用来向美国进口。（此乃台湾中央银行有很多美元储备，中国大陆人民银行也有很多的外汇储备的原因）。这样一来，美国就可以享有很大幅度和很长期的贸易逆差，同时美元储备所能获得的利息也很低，而让美国占了很大的便宜。

从图 11 中可见，因为很多贸易伙伴彼此不相信对方的货币，而使用美元来清算与结算，所以 2017 年虽然美国只占全球的贸易总值约 12% 左右，但全球用美元支付结算的贸易却占了约 40%。在 2017 年排名第二的支付货币是欧元，约 30%，但欧元区贸易里面有很多是区内的国际贸易，当然是利用欧元结算。所以其它第三国多半是利用美元。排名第三的支付货币是英镑。中国大陆占的贸易比例是相当高的，超过 10%，但利用人民币来结算的国际交易现时还不多，只有 2% 左右，低于日圆与加拿大元。

图 11：2017 年各个国家其货币占全球贸易结算货币与全球贸易份额



美国从 1980 年到现在，累积的贸易逆差是十兆美元，即是它进口的十兆美元商品与服务，是用印钞票和债券的方式来结算，同时债券的利率也很低。假如美国在国际上真的欠人家十兆美元的话，每年得到的好处就是在利差。美国利率跟其它国家利率的利差，假如是 1% 的话，每年就有一千亿美元的净利益，这虽然不是实际的数字，但也可说明铸币权对美国有很大的好处。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我先谈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然后我还希望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第一，全球化下除了赢家之外，一定会有输家，而且市场不会自动补偿输家。把全球化带来的整体利益，一部份用来补偿输家，是政府与社会的责任。

第二，全球化之下竞争非常激烈，因为全球所有的经济体都是彼此的竞争对手。大家还记得几十年前，台湾是全球最大的制鞋国，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一双鞋是台湾制造的，因为随着台湾的工资上升，劳动力成本变高，制鞋业都移到中国大陆，但现在中国大陆的成本也高了，制鞋业都又迁到越南、柬埔寨与孟加拉国等地。

第三，我要谈一下要素价格平等化定理 (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这是由诺贝尔奖经济科学奖得主保罗·萨缪森 (Paul A. Samuelson) 教授所提出的。他说各国同样的生产要素，例如没有技能的劳动力，在假设全球贸易完全自由及没有运输费用的情况下，其价格就一定会下降到等同于全球最低的水平。全球没有技能的人最多，工资最低，是在什么地方？可能是非洲。人不需要移动，因为产业会移动，在美国也好、台湾也好、香港也好，能够搬走的就业机会都已经搬到较便宜的地方去了。这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没有技能的劳动力一定会面临工资不但不上升，反而会下降的问题。所以美国最近这一、二十年所有蓝领工人薪资都没有增加，反而是那些技术人员、工程师、与信息通讯业雇员的薪水都高升，这都是事实。

第四，假如政府不想办法去补偿全球化的输家，结果将是国内的所得分配会越来越不平均，这不只台湾如此，美国、香港，甚至全球都有这种现象。正如《21 世纪资本论》作者汤玛士·皮凯堤 (Thomas Piketty) 所提出，在每国国内的所得分配都是变得更不平均。但其实在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分配差距，倒是在收窄。在中国大陆境内所得分配是非常不平均的，可是整体收入在上升。所以从全球角度来看，全球的所得分配倒是越来越趋向平均的。

第五，当然我们看到，全球化下有很多机会让一些企业去垄断整个全球市场，像苹果 (Apple)、谷歌 (Google) 跟微软 (Microsoft)，它们不是寡头，就是准寡头。再如亚马逊 (Amazon)，如果不是大陆有阿里巴巴和百度，可能老早就打进大陆市场了，会比现在更大。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政府的监管是必须的，不能让企业有太多的寡头行为。以美国经验而言，如当年没有司法部对 IBM 的反垄断判例，可能就不会有微软；如果没有对微软的反托拉斯判例，也不一定会有苹果与谷歌。让企业太独占市场，不只消费者会吃亏，也会阻挠技术进步。

第六，全球化会扩大境外发展对经济的影响。从下面的图 12 可以看出，大的经济体，像日本、中国大陆跟美国，对于出口的依赖度是很低的；但香港跟新加坡都是很高的。从图 13 至 14，可以看到虽然大经济体的出口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与小经济体的差不多；而进口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差不多。但是图 15 显示，大经济体的实质 GDP 的增长率的波动性比较低，不太受外部波动的影响。而香港和新加坡是小型经济体，受到的影响就很大。台湾当然也不是大经济体，所以就需要建构较完善的社会安全网来减缓外部影响的冲击。

图 12: 东亚、印度及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占 GDP 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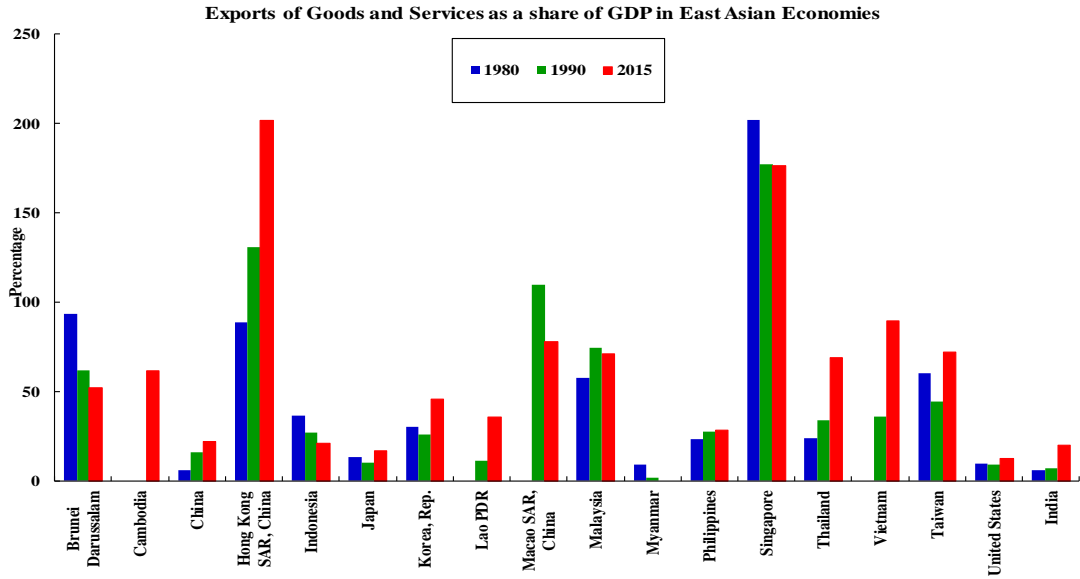


图 13: 部分东亚经济体商品出口的季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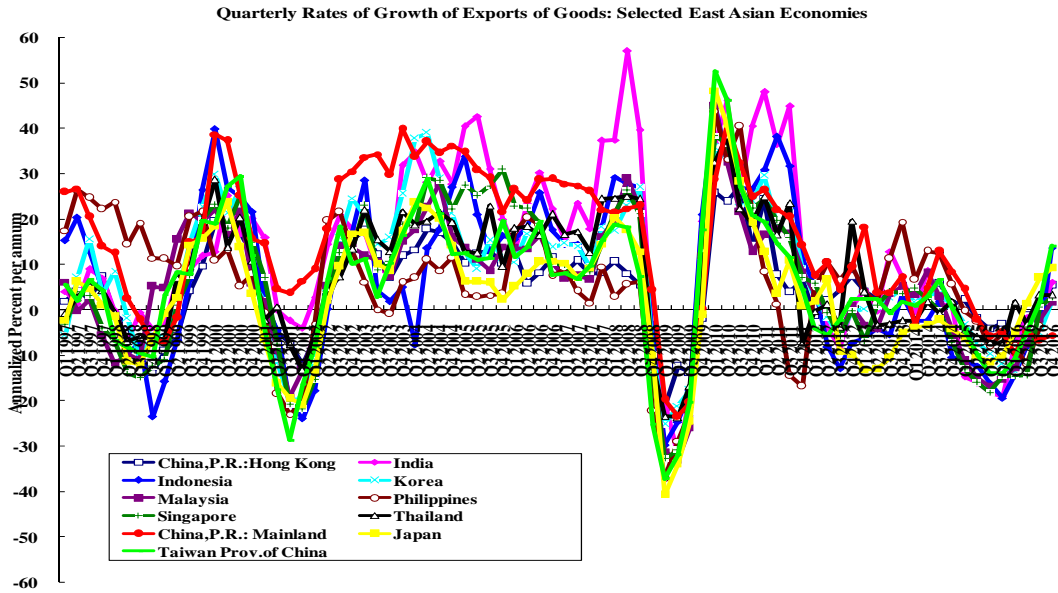


图 14：部分东亚经济体商品进口的季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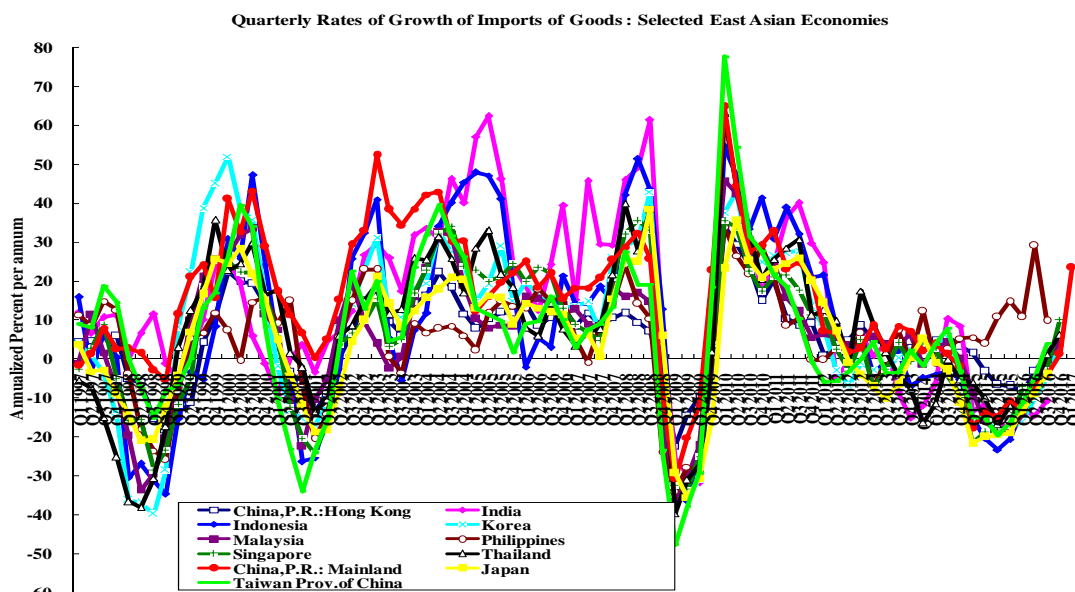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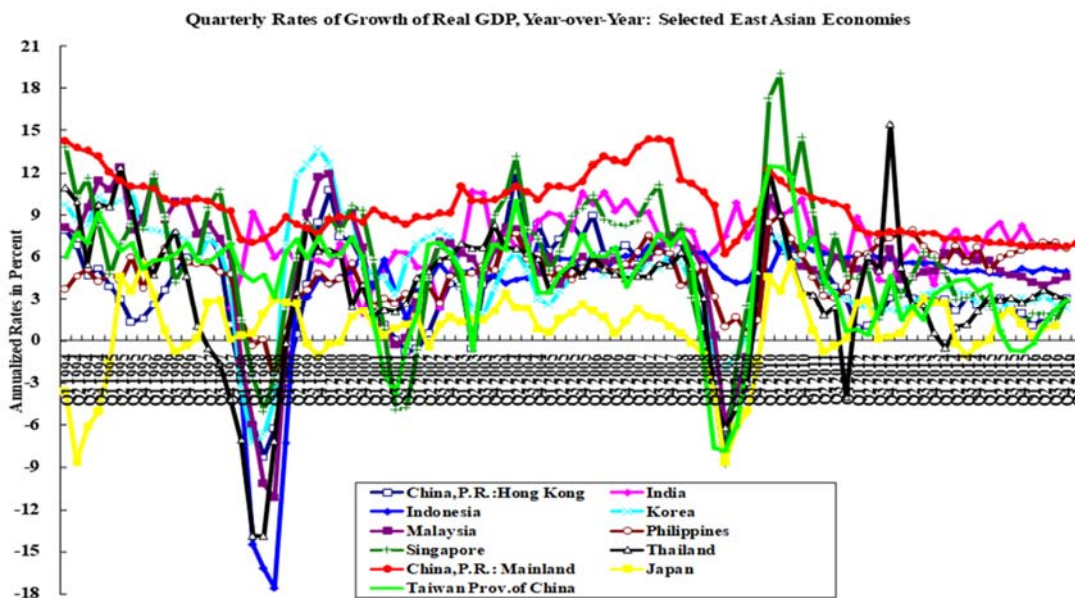


图 15：部分东亚经济体实质季 GDP 对上年同季的年增长率



第七，在全球化下，流通性泛滥，短期资本到处跑，时进时出，会影响一些小经济体的外汇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增加风险。东亚国家在 1997 与 1998 年就因短期资本大量撤出而酿成金融危机。短期资本流入流出，需要监控，一不小心就会出事。

降低全球化的社会成本

如何能够降低全球化对一个经济体的社会成本？

第一，课征进出口税。输家必须受到补偿。要怎样补偿呢？建议由赢家付一点税，这税要怎么收呢？我觉得很简单，就是针对所有出口商品，加征 0.5% 或者是 1% 的税；对所有进口商品也是一样。总之进、出口都课同样的税。这是什么道理呢？出口商当然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进口商也是进口利润受益者，所以要他们付一点税，其实很公道，进口商也可以把税转嫁到进口货品的消费者与使用者身上。这些税收就可以拿来补偿那些因为国际贸易丧失就业机会或薪资降低的人。假如是年轻人，就重新培训他们，增进及加强他们的工作技能，让他们再就业；而 55 岁之上的中老年人，反正到 65 岁就要退休了，因为他们年纪大，重新培训不一定有效，也只能再工作几年，建议让他们拿长俸。要这样做才能把输家变成不输，可能让他们赢一点，不然，全球化是可能走不下去的。进出口同时都课同样的税，也可以避免造成价格的扭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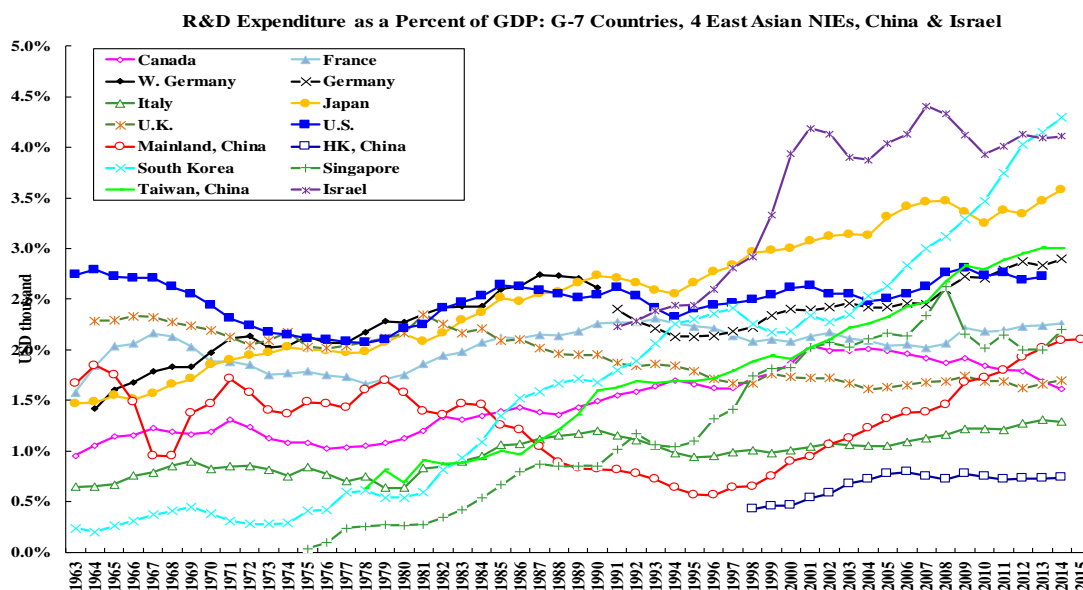
第二，课征托宾税。要减少短期资本的流进流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士·托宾 (James Tobin) 教授提出的托宾税 (Tobin tax)。他在 1972 年提出建议，针对跨境资本流动课税。例如资本从国外汇进台湾，就课 1% 的税，汇出时也要再课 1% 的税。如果是五年的长期投资，一进一出总共要课 2% 的税，但经五年一分摊后，每年成本只有 0.4%，不太会影响投资者的长期投资计划，可以承受。反之，打算把钱汇进来，作短期投机，炒新台币汇率升值，一个月就走，年利率成本就变成是 24%，如此投机者就不会选择来台短线炒作。所以征收托宾税可以区别短期资本和长期资本。长期资本的流入是有助于一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而且长期资本相对稳定，而投资者亦希望这个经济体可以继续增长，这对被投资经济体是有利的。短期资本流入基本上是投机的，只汇率炒高一点便离场，或是卖空被投资国的汇率，赚了钱就走，这会影响到该经济体汇率以及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也会对其经济造成负面冲击。其实利用外国短期资本作长期投资的风险是很大的，东亚国家在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吃过很大的亏。所以我们应当鼓励长期资本流入（或流出），不鼓励也不欢迎短期资本流动。

第三，改善强化社会安全网。国际贸易会使国内的在全球化下，和进口产品与服务竞争的产业可能会萎缩，而产生结构性失业；其次，经济和国际连动愈密切，一旦国际经济波动，便会受影响，例如美国不景气马上会使台湾对美国出口减少，从而产生周期性失业。要协助这些周期性失业的人，就需要建立社会安全网。更需注意，在今日这转

变迅速的社会，不可能一个人 22 岁找到工作便终身做到 65 岁不变，每个人都需要终身学习与再训练，社会有维持失业人口生计与再就业的责任。

第四，强化对无形资本的投资。无形资本其实是指人力资本与研发 (R&D) 资本，它们是创新最主要的元素，没有研发投入就很难有创新。也是驱动经济成长最重要的力量，尤其是在已发达的经济体。图 16 显示 R&D 投入占 GDP 的比重，台湾、韩国跟日本的比例，相对其它国家，都算是高的。因为全球化下的竞争相当激烈，不持续创新的话就会落后，落后之后就不太容易再赶上。例如台积电一直很重视研发，是台湾研发金额投入最高的企业，所以它能一直维持世界晶圆代工的龙头地位。

图 16: G7 国家、亚洲四小龙、中国与以色列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



另外，图 17 显示一些国家在美国拿到获得的专利权数，美国排第一，日本排第二，台湾跟韩国的排名也都相当高，而中国大陆也在赶上。

图 17: G7 国家、亚洲四小龙、中国与以色列在美国取得的专利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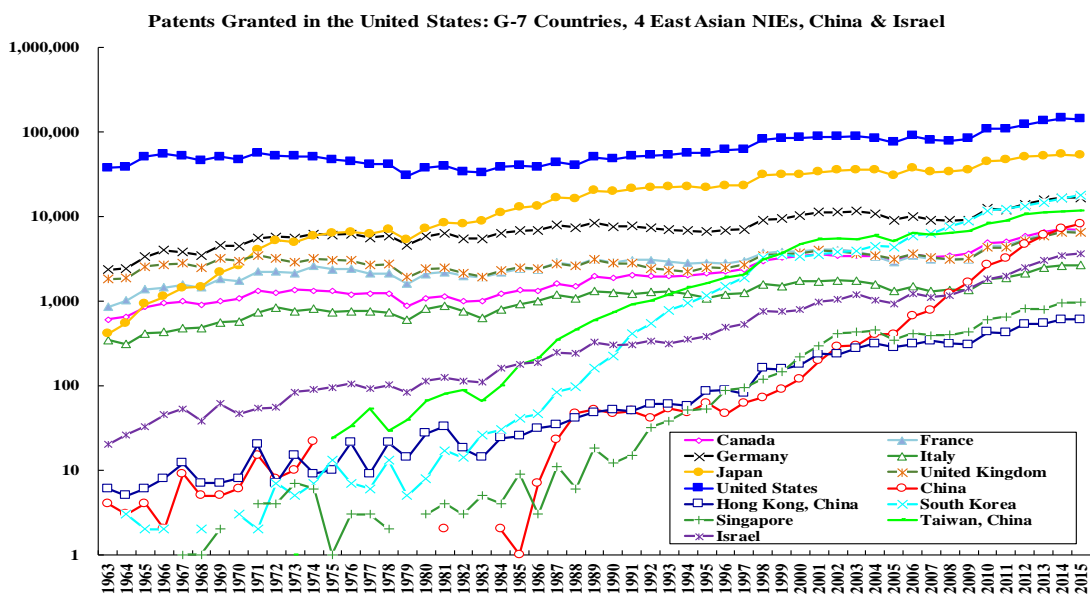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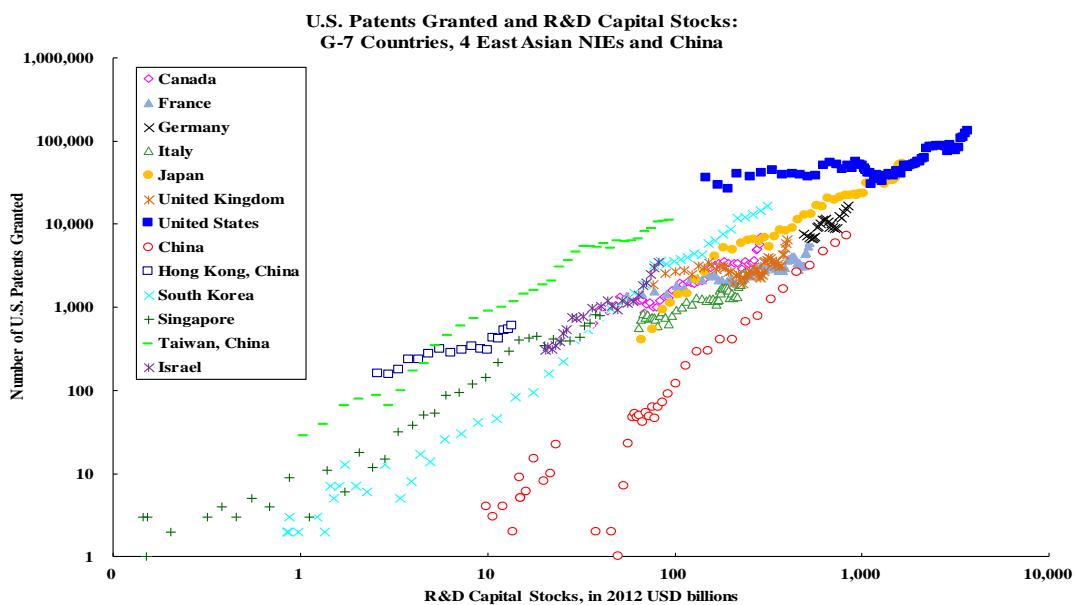


图 18 则显示专利权数跟研发资本存量有相当密切的正向关系，从研发资本跟获得专利权的数字来参照，可以发现研发资本越多，获得的专利权数也就越高，发明与发现都需要投入。

图 18: G7 国家、亚洲四小龙、中国与以色列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权数及研发资本存量



结语

经济全球化对所有参与全球经济的经济体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全球化也在这些经济体之内，创造了赢家和输家。所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要如何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好好地再比较均匀分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需要政府主导，作重分配，让所有人民都能得益，这是政府与社会的责任，而不能单靠市场。在转型调整的过程中，市场不会照顾或再培训那些因全球化而被进口影响因而失业的人，也不会负担这些人的生活。政府应当能够做到没有输家，这样全球化才可以持续下去。

像台湾这样的小型经济体，大部份原料物资都依赖进口，大部份生产都需要出口，不可能闭关自守，完全没有实行孤立主义或保护主义的条件。自从 1950 年代中期开始，台湾一直是全球化的得益者，所以台湾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必须设法补偿输家，防范风险，推广教育，培养人才，投资研发，增强竞争力，改善社会安全网，还应当继续支持全球化。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参考文献

- Fleming, J. Marcus (1962), "Domestic Financial Policies under Fixed and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IMF Staff Papers, 9(3): 369–380.
- Maddison, Angus (2006), The World Economy: Vol. 1: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and Vol. 2: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Friedman, Thomas L. (2005),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Mundell, Robert A. (1963),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9(4): 475–485.
- Piketty, Thomas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Belknap.
- Samuelson, Paul A. (1948),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qualisation of Factor Prices", The Economic Journal, 58(230): 163–184.
- Tobin, James (1978), "A Proposal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4(3/4): 153–159.